



新中国成立60周年学术论丛

总主编 黄蓉生

重庆抗战 诗歌研究

CHONGQING KANGZHAN SHIGE YANJIU

吕进 熊辉 著
张传敏 张立新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新中国成立60周年学术论丛

总主编 黄蓉生

重庆抗战 诗歌研究

CHONGQING KANGZHAN SHIGE YANJIU

吕进 熊辉 张传敏 张立新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庆抗战诗歌研究/吕进等著.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5621-4747-3

I. 重… II. 吕… III.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3145 号

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学术论丛

重庆抗战诗歌研究

吕进 熊辉 张传敏 张立新 著

责任编辑:钟小族

书籍设计: 周娟 刘玲

出版、发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庆·北碚 邮编:400715)

网址:www.xscbs.com)

印 刷: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5.5
字 数:27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21-4747-3

定 价:28.00 元



“新中国成立60周年学术论丛”编委会

主任：黄蓉生

副主任：宋乃庆 陈时见 吕 进 戴思锐 何向东 张诗亚

委员：崔延强 蓝 勇 徐 辉 周安平 张国镛 李远毅

孟小军 李 惠 卢 旭 温 涛 杜 勇



总序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60 年一甲子,60 年旧貌换新颜。新中国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壮丽篇章,必将作为人类争取自由解放和文明进步的光辉一页载入史册。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60 年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中央要求,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与实践齐发展,充分发挥了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学校的哲学社会科学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和学校事业发展的进程,在探索中发展,在改革中前行,不断取得重要成果,涌现出了如吴宓、张敷荣、罗容梓、普施泽、方敬、邓子琴、高振业、孙培良、邓胥功、苏葆桢、刘一层等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83 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其中蕴含的深刻理念,不仅成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根本性指针,也为哲学社会科学在新时期的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1992 年 10 月,学校召开了第一次科研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意见》,对科研工作的运行机制作了重大改革;明确哲学社会科学要加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研究,加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以及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问题研究。这一时期,在学科建设方面,获得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1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点 3 个,硕士学位点 24 个,形成了课程与教学论、基础心理学、教育学原理、中国现当代文学等一批有影响的优势学科,走出了如熊正瑜、许可经、张宗禹、刘又辛、魏兴南、何剑薰、刘兆吉、任宝祥、杨群章、黄希庭等一批知名专家学者。

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更加强调和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2001 年至 2002 年间,江泽民在北戴河、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了关于重视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讲话。2004 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2007 年 10 月 15 日,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

涛进一步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提升到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哲学社会科学得到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在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在大力开展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在认真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在扎实开展学科和教材建设,在广泛开展学术交流等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发挥了积极作用。在2003年至2008年间,学校先后两次调整科研政策,狠抓制度建设,强化系统管理,加大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创新意义的重大研究成果。目前,学校学科门类齐全,科研实力雄厚,特色明显,涵盖了哲、经、法、文、史、教、管七大哲学社会科学学科门类的全部学科,基本形成了以教育学、心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农林经济管理为主要特色的学科体系。迄止2008年底,学校哲学社会科学拥有2个国家重点学科,3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8个博士学位授予点,67个硕士点,1个专业博士学位点(我国15个首批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授予权单位之一),7个专业硕士学位点,建有1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1个重庆市文科重点研究基地。据不完全统计:自重庆市直辖以来,学校先后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1500多项,争取科研经费8000余万元,发表学术论文7000多篇,出版专著和教材1500多部,各类成果获得各层次奖励220多项。

实践证明,在波澜壮阔的60年中,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间,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得到长足发展,教育学、心理学等研究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为提升学校的综合实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写下可圈可点的辉煌篇章。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进一步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升人文价值,塑造文明、开放、民主、科学、进步的民族精神,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不断推向前进,特推出《新中国成立60周年学术论丛》。论丛共六册,它既是学校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多年研究的代表作,更反映了广大哲学社会工作者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中的责任与追求,探索与奋进。

《科学发展观若干问题论析》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黄蓉生教授主编,共分十二个部分,包括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形成、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方位、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基础、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以及如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等等,力求准

确全面地揭示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和实质,做到框架体系独特,内容观点正确,语言文字活泼,是广大青年大学生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辅助材料。

《重庆抗战诗歌研究》由西南大学新诗所吕进教授等著。该成果认为,目前抗战文学的历史价值和现实特殊的审美观照方式已经成为学术界探讨的重要话题,但抗战诗歌研究与抗战时期丰富的诗歌创作和活动形成了巨大反差,尤其是对抗战文化十分发达的重庆的诗歌研究更显不足。重庆抗战诗歌无论在诗歌思潮的引导上、诗人队伍的组成上,还是在诗歌主题、题材、风格的选择上,早就超越了地域界限,在诗歌史上具有全国意义的内涵,对重庆抗战诗歌的研究,对当下诗歌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该成果从重庆抗战诗歌的研究现状、时代特色、诗学观念、文体形式以及对重庆抗战诗歌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协”、七月诗派和诗歌刊物等方面对重庆抗战诗歌做基础性的史学清理和理论研究,从而改变重庆抗战诗歌研究的孱弱现状,以期引起学术界对重庆抗战诗歌的进一步关注。

《回归位育——教育行思录》由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张诗亚教授著。传统教育学认为,教育是单向“适应”社会发展的,或为政治服务,或以经济为中心,或为科学技术奠定基础,这一观念左右了教育政策、教育实践的方方面面。该成果认为,这种观念在理论上与“以人为本”的教育观不相容;在实践上严重误导教育事业的发展。故针对性地提出“位育”教育观。“位”者“安其所者”,“育”者“顺其生也”。“位育”的秩序强调了环境周围的世界对生命体的规定,而“育”是进步,强调了主体既调整自己,也改变环境以适应自己的进步。故而,从观念上强调了教育与社会的作用;强调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相互作用,而非单向的谁“适应”谁的关系。继而,从实践上划分了位育教育的三个层次:人类与自然位育(即相互作用);人类群体与群体(如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等等)的位育;个体与个体的位育,以期从根本上调整以教育失当为特征的社会发展模式的失当。

《“湖广填四川”与清初四川社会》由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蓝勇教授、三峡大学三峡文化与旅游规划中心黄权生讲师等著。该成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重要研究成果,对“湖广填四川”的历史过程从环境、移民、老四川文化角度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特别是从移民地名、竹枝词中发现了大量移民历史的信息,复原了清代初年的四川社会经济文化状况,附有“湖广填四川”电视脚本和大量清代移民遗留下来的遗迹照片,是我国在“湖广填四川”移民研究方面将

田野考察与计量研究相结合的上乘论著。

《中国西部农村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研究》由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温涛教授、西南大学常务副校长宋乃庆教授、西南政法大学王煜宇副教授著。该成果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CGA060067)、重庆市教委重大软科学项目(KJ06CA1)和西南大学农业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的最终成果。在深入考察西部地区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基础上,作者实证分析了西部地区农村教育对农村经济发展各项指标的实际效应,揭示了新农村建设背景下西部地区农村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针对性地设计了西部地区农村教育的发展战略和制度创新框架,最后提出了适应西部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教育发展政策。

《中国上市公司的亏损问题研究》由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杜勇博士著。该成果以中国亏损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对上市公司发生亏损的原因和发生亏损后的扭亏途径进行整理和述评的同时,重点对上市公司在发生亏损前的征兆,发生亏损过程中的特质和价值,亏损前、中、后三个阶段中影响亏损公司股价的因素等内容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以期为完善上市公司内外部治理结构、防止上市公司业绩变脸、提升上市公司业绩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和措施;为规范证券市场行为、提高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使得“壳”资源得到合理优化的配置,从而减少中国股市的投机行为,维护中国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提出建议和意见;使得投资者能够正确识别上市公司的亏损特质和真实价值,帮助投资者作出科学合理的投资决策。

古人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一传统绵延了几千年,从未中断。经过新中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我们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极为有利的条件,作为学校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理应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把握正确方向,发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深入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入研究阐释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深入研究阐释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以严谨治学的态度打造精品力作,坚定信心,求真务实,继续推进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各项工作,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为发展学校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总序	
绪论	(1)
第一节 重庆抗战诗歌的研究现状	(1)
第二节 重庆抗战诗歌研究的几个重要维度	(7)
第一章 重庆抗战诗歌概论	(15)
第一节 抗战诗歌与“五四”新诗传统	(15)
第二节 内迁潮流与重庆抗战诗歌的发展	(24)
第三节 重庆抗战时期的诗歌观念	(30)
第四节 抗战诗歌的几种特殊传播方式	(37)
第二章 重庆抗战诗歌文体	(44)
第一节 重庆抗战诗歌的文体转变	(44)
第二节 抗战时期朗诵诗的文体特征	(56)
第三节 抗战时期街头诗的文体特征	(69)
第三章 “文协”与重庆抗战诗歌	(83)
第一节 “文协”的文学立场	(83)
第二节 “文协”在重庆的诗歌活动	(91)
第三节 “文协”与中外诗歌交流	(100)
第四节 《抗战文艺》的诗歌	(110)



第四章 七月诗派与重庆抗战诗歌 (124)

第一节 七月派诗人在重庆 (124)

第二节 《七月》及其抗战诗歌 (149)

第三节 《希望》等刊物中的抗战诗歌 (169)

第五章 重庆抗战时期的文艺报刊与重庆抗战诗歌 (188)

第一节 重庆抗战时期文艺报刊的“诗歌场”效应 (188)

第二节 《新华日报》与重庆抗战诗歌 (205)

第三节 《大公报》(重庆版)与重庆抗战诗歌 (223)

后记 (236)

绪 论

1

绪
论

第一节 重庆抗战诗歌的研究现状

在抗日的烽火中产生的抗战诗歌因为战争和政治因素而从地域上划分为大后方诗歌(亦有人将之称为“国统区抗战诗歌”^①)、沦陷区抗战诗歌、革命根据地抗战诗歌以及香港等海外抗战诗歌。如果“把中国抗战文学比喻为一棵大树,那么,大后方文学自然便是这棵大树的主干”;如果“大后方文学最能体现出中国抗战文学的完整性与特殊性”^②,那大后方诗歌在繁芜的抗战诗歌中同样具有整体性的代表意义。重庆作为战时的陪都,作为当时中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其抗战诗歌在大后方诗歌中无疑又具有典型意义。目前,抗战文学的历史价值和现实特殊的审美观照方式已经成为学术界探讨的重要话题,大后方诗歌研究也在这样的语境中逐渐展开。但重庆大后方诗歌研究与抗战时期丰富的诗歌创作和诗歌活动形成了巨大反差,与当时重庆诗歌在抗战中起到的“鼓动”作用和历史价值明显脱节。有鉴于此,本书特地对有限的重庆抗战诗歌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以发现已有研究的不足和有待进一步加强的研究领域,进而改变重庆抗战诗歌研究的孱弱现状。

重庆抗战诗歌研究的第一个重要阶段是抗战期间,即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重庆抗战诗歌的发生和成熟期。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配合抗战需要对重庆诗歌创作和诗歌活动做出及时的评价和指导,让诗歌创作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声援民

^① 比如,文天行先生在其主编的《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一书将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文学称为“国统区文学”。又比如,苏光文先生认为“‘大后方文学’,其实就是指1938年10月以后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文学”。(苏光文:《大后方文学论稿》,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页。)

^② 苏光文:《大后方文学论稿》,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8页。



族抗战行动。因此,强烈的批判精神成了该时期重庆乃至大后方诗歌研究的总体特征。

重庆抗战诗歌的研究首先集中表现为对诗歌情感内容的批判。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诗人和文艺工作者们认识到诗歌应该和民族的抗战现实相结合,诗歌对社会责任和民族责任的担当成了人们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衡量诗歌作品是否适宜生存的主要标尺。因而,不关注抗战现实的创作路向必然遭受诗歌批评界的普遍质疑和批判。1938年2月20日,黎嘉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诗人,你们往哪里去?》的评论文章,主要是对欧外鸥、柳木下、黄鲁、欧罗巴、胡明树和扬起等自称为“少壮派”的诗人出版的“一种漂亮的诗刊《诗群众》”提出批评,认为他们的作品与当前国内的抗日战争“似乎没有多少关系”,其诗歌主张也没有多少新鲜的东西,“他们只是混杂的抄袭着未来派(意大利的未来派和俄国的未来派同样被抄袭)以及日本早就没落了的‘新感觉派’的玩意儿而已”。该文最后提醒所有的诗人,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诗人们的诗篇,也必须是帮助这种神圣的战争的”^①。抗战时期的诗人在特殊的时代场景中应该抛弃忧郁的自我抒情方式,投入到民族抗战的洪流中才能使诗歌创作走上健康明朗的道路。1943年12月20日,《新华日报》发表了简壤的文章《诗人的忧郁——读王亚平〈生活的谣曲〉》,指出诗人王亚平在其作品《生活的谣曲》中表现出来的忧郁是有代表性的。作者分析了诗人忧郁的原因是他们的“热情容易燃烧,也容易马上冷却”,“更加上生活的单调和沉闷,他感到淤塞枯寂的烦恼。这正是诗人所以忧郁的原因。”除了分析原因之外,作者还为诗人们摆脱忧郁指明了道路:“为了更大的进步,那末就必须抛弃掉这种病态的忧郁,否则诗人便不能更爽朗地生活,更深入地去思想,更广阔地去接触世界。”^②这篇文章是对抗战诗歌内容的批判,由于诗人在诗歌作品中抒发忧郁的内心世界与表达抗战的激情和对祖国的热爱相脱离,与抗战时期的诗歌观念存在较大距离,因此受到质疑和批评也在情理之中。

其次,抗战时期重庆诗歌的研究体现为对诗人创作思想的批判。对诗与现实关系的强调要求诗人在创作过程中把主观情感和客观现实联系起来,要求抗战时期的诗人把自身的情感体验和民族战争的实际相结合。胡风从大后方诗歌创作实际出发写了《今天,我们底中心问题是什么?》一文,肯定了徐中玉先生“作家们如果没有能够以一个战士的姿态出现于现实生活的斗争里,他是不能够创

① 黎嘉:《诗人,你们往哪里去?》,《新华日报》,1938年2月20日。

② 简壤:《诗人的忧郁——读王亚平〈生活的谣曲〉》,《新华日报》,1943年12月20日。

造出真实伟大的艺术来的”，进而他认为“对于特定作品或特定作家底创作过程的评价的分析就能够说出特定作家和客观生活的联结情况或联结程度”。正是从作家与客观生活的联结出发，胡风批评了穆木天对抗战诗歌的看法，认为其关于“抗战诗歌底‘大部分’是‘个人主义抒情主义’，‘个人主义的感伤主义’”的看法“不是事实”。同时还批评了徐迟关于“干脆地把抒情‘放逐’”的观点，认为这“不但把抒情监禁在对自然的感应里面，还把抒情和科学弄成了对立”^①。诗人的创作不仅应该从现实出发，而且在思想上还必须具有爱国情怀。1944年6月25日，《新华日报》发表了臧克家的《吊古，自吊。》，文章高度赞扬了屈原高洁的爱国品格：“今日的诗人同样有高尚的政治理想——民主与自由；同样有献身民族的意志，也同样有高洁的人格与爽朗的胸怀。可是，在精神上，多少诗人却做了刖足的献宝者！把整个灵肉交给了国家，但，还需双手捧着自己的一颗血淋淋的心到处求人辨认。”“今天，诗人节，诗人们吊罢古人，更该自吊，自发、自奋！”^②臧克家的话暗含着对否定抗战诗歌观念的部分言论的反驳，表明抗战时期的大后方诗歌应该和民族命运相连，诗人应该对祖国的命运和时局保持近距离的观照。

第三，抗战时期重庆的诗歌研究体现为对诗歌文体艺术的批判。抗战时期的大后方诗歌由于对抗战现实的关注而忽视了艺术的建构，不少评论家从诗歌艺术的自律性立场出发对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提出质疑。1942年，施蛰存存在《文学之贫困》一文中针对抗战文学的现状提出疑问：“抗战以来，我们到底有了多少纯文学作品？你也许会说：我们至少有了不少的诗歌和剧本。是的，我也读过了不少的诗歌和剧本，但是如果我们把田间先生式的诗歌和文明戏式的话剧算作是抗战文学的收获，纵然数量不少，也还是贫困得可怜的。”^③此言论是对在轰轰烈烈的抗战文艺运动中创作的抗战文学的冷静反思，是站在纯文学立场上来打量抗战以来的小说、诗歌和戏剧等文学样式的得失。也有人针对诗歌形式短小和表现力缺乏等现象提出批评，比如1938年秋天，魏孟克在重庆文化座谈会上代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发表了《抗战以来的中国文艺界》的报告，指出抗战开始以后，“结构极为庞大的作品渐不多见了，已大抵属于短小精悍、富有煽动性的速写和随想——即报告文学和杂文一类；就是戏剧

① 胡风：《今天，我们底中心问题是什么？》，《七月》（5集1期），1940年1月7日。

② 臧克家：《吊古，自吊。》，《新华日报》，1944年6月25日。

③ 施蛰存：《文学之贫困》，《文艺先锋》（1卷3期），1942年10月。

及诗歌,也往往取着报告的体裁”^①。1938年11月25日,“文协”举行诗歌座谈会,厂民认为抗战诗歌的缺点是:一是口号标语化;二是软弱无力,“到今天为止,我们见到了多少描写战斗生活的逼真动人的诗歌呢?”^②

此外,也有人专门研究诗歌的某种文体,比如1945年6月14日,《新华日报》发表了臧克家的《向黑暗的“黑心”刺去——谈政治讽刺诗》,认为诗人在抗战的时代洪流中应该保持积极而活跃的心态:“只要你耳不聋,或不装聋;只要你眼不瞎,或不装瞎;只要你心不死,或不装死,总不愁这些已死的、现存的、新生的、死而复活的事件,不来碰你、刺你,鼓动你起来。”^③说明了凡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都会受到抗战气氛的影响而投入到民族解放大业中去,同时也说明了讽刺诗这种文体形式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抗战作用。

抗战时期重庆和整个大后方的诗歌研究文章主要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时代的特殊需要决定了这一时期的诗歌研究必然在审美价值的取向上与民族解放保持一致,那些与时代现实和抗战运动背离的文章必然遭受质疑和批判,从而使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诗歌研究具有更多的批评精神和“规定性”审美眼光。

二

重庆以及大后方诗歌研究的第二个重要阶段是新时期以来至经济体制改革期间,即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随着思想解放潮流的兴起,对大后方戏剧、通俗文学、散文、报告文学和小说等文体的研究以及对大后方文学的全局把握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并有相应的专著出版。而且重庆抗战文学的研究在新世纪里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重庆抗战诗歌和大后方诗歌研究相比之下显得比较贫乏,但在抗战文学研究的热潮中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和提高。

该时期重庆抗战诗歌的研究大都混杂在大后方诗歌的研究中,其成果主要散见于多本专著的部分章节中。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开始,四川教育出版社陆续推出了“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丛书”,主要包括:《大后方戏剧论稿》(廖全京著,1988年),《大后方散文论稿》(尹鸿禄著,1990年),《大后方的通俗文艺》(杨中著,1990年),《大后方文学史》(文天行,吴野主编,1993年),《火热的小说世界》(文天行著,1992年),《战火中的文学沉思》(吴野著,1990年),《国统区抗战

① 魏孟克:《抗战以来的中国文艺界》,《抗战文艺》(2卷6期),1938年10月15日。

② 《我们对于抗战诗歌的意见》(诗歌座谈会记录),《抗战文艺》(3卷3期),1938年12月17日。

③ 臧克家:《向黑暗的“黑心”刺去——谈政治讽刺诗》,《新华日报》,1945年6月14日。

文学运动史稿》(文天行著,1988年),《抗战诗歌史稿》(苏光文著,1991年)。这套丛书还配套出版了诗歌、小说以及文学理论的史料集,其中就诗歌而言,龙泉明先生编选的《诗歌研究史料选》(1989年)对抗战以来的诗歌大事进行了归纳整理,为我们今天研究大后方诗歌和重庆抗战诗歌提供了很多详尽的资料。苏光文先生的《抗战诗歌史稿》是迄今为止唯一与重庆抗战诗歌研究相关的著作,该书对以抒写抗日救亡为主题的诗歌理论、情感内容、抒情形式及重要诗人等作了较为详尽的研究,分为诗坛巡礼、诗派诗人举要、旧诗新话等几个部分,勾勒出了1937年到1945年的新诗发展轮廓,并对于抗战诗歌的成就和特征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孙玉石先生在评价该书时写道:“抗战是一个关系全民族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但有关抗战的题材并不是唯一的‘现实’的题材,特定历史时期的诗人的责任感并不一定就是新诗一种普遍性的本质特征和价值尺度;在诗人、诗歌与时代的关系上,研究的视点显得比较狭窄,一些足以反映抗战诗歌发展的十分复杂的历史现象,包括美学思考的分歧和创作走向的轨迹,多种创作方法的参与抗战诗歌创造时出现的丰富形态,都还没有得到更符合历史实际的描述和论析。”^①但事实上该书对抗战诗歌的研究由于在创作成就和审美取向上受研究对象的局限而难以达到普通诗歌史研究的丰富程度。虽然该书不是专门研究重庆诗歌的专著,但其研究内容却涵括了重庆抗战诗歌,不仅在抗战诗歌的研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开拓价值,而且在重庆和大后方抗战诗歌的研究进程中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苏光文先生1994年出版的《大后方文学论稿》(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在“创作篇”中对“中国诗坛派”、“七月”诗派和后期现代主义诗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文天行和吴野主编的《大后方文学史》专列第三章来谈大后方的诗歌,这两本书的部分章节对大后方诗歌的论述是新时期以来大后方诗歌研究中比较重要的成就,虽然对某些诗歌现象的认识和论述用今天的眼光打量还存在不足,但在少量的大后方诗歌研究成果中却也显得弥足珍贵。其中涉及对重庆抗战诗歌的研究。此外,重庆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20册,其中第六编为臧克家选编的两册诗歌集,收录了抗战时期大后方重要的诗人诗作,为大后方诗歌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诗歌文本。进入21世纪初叶,吕进先生等人撰写的《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开拓了地域新诗史研究的先河,作为战时的陪都,重庆繁

^① 孙玉石:《中国新诗研究15年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94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年鉴》编辑委员会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

荣的抗战诗歌自然成为本书观照的重要内容之一。该书第二章《抗战时期：重庆新诗的第一次高潮》对重庆抗战诗歌组织、社团、诗歌刊物和重要诗人做了较为全面的“扫描”。但由于“史”的书写需要体大虑周，抗战时期大后方诗歌自然在这部诗歌史中没有得到详细的论述。靳明全先生主编的《重庆抗战文学与外国文化》（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论述了重庆抗战诗歌与外国诗歌的关系，第三章《重庆抗战诗歌与苏联诗歌》和第四章《重庆抗战诗歌与英国文化》专门探讨了重庆抗战诗歌与苏联和英国诗歌文化的关系，是迄今为止从中外文学关系的角度和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角度来研究重庆抗战诗歌的例证。

少量的论文也彰显出新时期以来的重庆抗战诗歌研究成就。重庆和大后方抗战诗歌研究迄今为止不仅没有推出专著，而且从已发表的论文来看，其数量也远远比不上戏剧、散文、小说、电影或者报告文学。以“大后方”为题名或者文章的关键词在CNKI学术期刊网上进行搜索，关于诗歌的文章只有1篇，即黄子健先生撰写的《悲壮的民族史诗——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诗坛观略》（《文史杂志》，1988年6期）。该文分三个时期对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诗歌活动、诗歌刊物、诗歌流派和主要诗人等进行了纵向的梳理，呈现了大后方诗坛的丰富性。以“抗战诗歌”为题名的论文有23篇，很多是对抗战诗歌的时代精神、抗战诗歌的特殊文体、抗战诗歌文本或诗人等方面的研究，其中专门谈论重庆抗战诗歌的只有1篇，即《〈七月〉抗战诗歌漫评》^①。维普数据网由于收录了部分民刊中的文章，因此除了前面关于大后方诗歌的文章外，还可搜索到臧克家先生的《伟大的时代洪亮的诗声——〈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诗歌编〉序言》（《中外诗歌研究》，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2003年3期）。这篇文章早在出版《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时就已经发表，是对抗战时期大后方诗歌本体的研究。臧克家先生从时代经历、创作实践以及诗歌研究等方面的经验出发，从四个方面概括了抗战时期大后方诗歌的“鲜明特点”。首先是创作主体，大后方的“诗人们以先锋队的姿态挺身而出，……向着一个伟大目标并肩前进”。其次是诗歌接受对象，“由于时代的要求，让诗歌普及于大众，向众多读者宣传抗日救亡”。第三是诗歌的表现主题，诗歌的情感内容本来应该由诗人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做出自由的选择，但由于抗战“关系到民族的盛衰，国家存亡，它是亿万人民所关注的主体，自然成为诗人们写作的主题”。第四是诗歌的文体，“抗战时期的诗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长诗，尤其是长篇叙事诗多起来了”。

① 李保均：《〈七月〉抗战诗歌漫评》，《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2期。

同时,“抗战后期,在大后方,讽刺诗兴起来了”^①。该文对抗战时期大后方诗歌的每部分内容、诗歌活动和诗歌现象都进行了论述,是大后方诗歌研究历史上的重要文献。

此外,四川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创办的内刊杂志《抗战文艺研究》坚持创办了30多期,其中对小说、戏剧、抗战文艺理论、木刻以及书刊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对大后方诗歌的研究相对而言比较稀少。即使涉及关于抗战时期大后方诗歌的文章,也多是对诗人佚文的发现,比如1983年4期上发表了苏锡的《郭沫若的一首佚诗》。1983年6期上发表了李华飞的《从〈诗报〉、“文协”诗歌座谈会到春草社》一文,是对重庆抗战时期诗歌刊物、诗歌社团和诗歌活动的回忆性文章,从局部为我们展示了重庆抗战诗歌的面貌。当然也刊登了少量的诗人诗作研究,比如1983年6期上发表了瘦民和苏菲撰写的评价老诗人杜谷作品的《梦的现实美——读〈泥土的梦〉》。

总体上讲,重庆抗战诗歌的研究还处于比较滞后的状态,已有的研究成果难以支撑起丰富的诗歌活动和创作。从研究的内容来看,除了对重庆抗战诗歌文本、诗歌活动或诗歌理论有所涉猎,但还需深入探讨之外,重庆抗战诗歌的诸多领域都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第二节 重庆抗战诗歌研究的几个重要维度

如前所述,重庆抗战诗歌乃至整个大后方诗歌的研究目前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况,不仅没有专门的著作诞生,而且连相关研究的专门文章都十分稀少。要在没有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的情况下展开对重庆抗战诗歌的研究,我们究竟应该从何着手呢?哪些内容将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呢?为此,本书认为重庆抗战诗歌的研究主要有如下几个重要的维度:

第一,重庆抗战诗歌的一般特征。重庆抗战诗歌是在全民族抗战的时代背景中产生的,而重庆作为战时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作为主要的大后方阵营,其抗战诗歌的观念必然有自身的独特性:抗战时期的重庆诗歌观念最集中地表现

^① 臧克家:《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诗歌编序》,载《祝贺与评价——〈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纪念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58~67页。